

● 中国现当代文学

“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

陆 耀 东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陆耀东(1930-),男,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 “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家庭中,作为长子、长兄,在教育部,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则主要是冲破、超越、创新,并非完全断绝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关键词] 五四;鲁迅;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10.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1-0079-05

“五四”时期鲁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行,近年来人们议论纷纷,且多有从文化守成主义出发执“X年一贯制”的“高见”,对鲁迅横加指责。本文拟从事实出发,以实证方法作学理式探讨和提问。

“五四”时期(1917—1924)的鲁迅,社会职务是教育部部员(初为二科科长,1912年8月为佾事),兼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高等学校讲师(1924年起被聘为教授),1923年和1924年,还在另两所学校兼课。他在各个学校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二:一是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的文艺理论课,二是用自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做教材的中国小说史课。前者是引进的外国文学思潮;后者则是谈传统文化,不过其观念已突破传统文化的樊篱。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只有诗、文是崇高的)。因此,开设这门课本身,就意味着超越了传统。我们必须看到,这时鲁迅的身份是公务员,大学教师是兼职,写作是业余的事。作为一个作家,他这时的成果主要收集在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论文集《热风》《坟》,散文诗集《野草》中。我们考察鲁迅此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应以他本人的行动、言论文字为根据,全面研究,任何简单化、片面化的判断都会离开历史的真实。

鲁迅不是神,他也是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很注意中国习俗礼节,亲友红白喜事、婚嫁乔迁、生老病死,他总要送礼或慰问,赈灾济难,他都捐款。这只要看看他的日记就会一目了然。他是敬老尊幼的模范,是称职的长子和长兄。他不主张在20世纪仍奉行封建孝道,但对母亲,他尽一切可能使之生活舒适,心情愉快。对长辈如蔡元培,他始终以师礼待之。对同学和朋友如许寿裳,情同手足。

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掌管的是:有关礼仪、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收集古物、通俗教育等事物。这是公务,个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能不做。如祭孔大典,仅据鲁迅日记,从1915年到1925年,他就参加过1915年3月17日、9月13日、1918年3月21日、1919年3

月 6 日、10 月 2 日、1920 年 3 月 20 日、1921 年 3 月 15 日、9 月 11 日、1922 年 3 月 25 日、1924 年 9 月 4 日共十次正式丁祭,均任“执事”。或“夜半”往,或“晨二时”启程,或天“未明”动身,或“黎明”赴。1922 年那次,还出了事故,“归涂坠车落二齿”。此外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死,6 月 15 日教育部派 5 人赴总统府吊祭,有鲁迅在内。为了使老母高兴,在老人 60 生辰那天,鲁迅“上午祀神,午祭祖”。但 1917 年 7 月 1 日张勋拥戴溥仪“登基”,鲁迅则愤而辞去教育部职务。作为教育部的一名官员,鲁迅的行为似无可厚非。

鲁迅这一方面的活动,绝大多数与传统文化并不相悖。这是受他的身分限制所致。至少,他对祭孔那繁琐的形式肯定会反感,但他是主管这一工作部门的官员,不能不参加。还必须看到在鲁迅为《新青年》撰稿之前,他感到寂寞、孤独、苦闷,加上他在教育部担负的工作与传统文化有关,使他对抄古碑、收集、整理、校勘古籍,研究文物和佛学,很感兴趣。可以说,这些工作也是他作为教育部官员的业务。

作为大学教师,鲁迅在“五四”时期讲的是“中国小说史”,并为我们留下了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稍后,还讲过“汉文学史”,印有《汉文学史纲要》。从这些著作看,他既客观地分析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大胆突破了传统文化观念,发表了一系列创见。如清之侠义小说,鲁迅指出,它系由茶馆的说书而通行到社会的。由于它不同于“《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1](第 339 页),“《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1](第 339 页)接着还将它与《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作比较研究,阐明异同。说:后一类小说,“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倦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1](第 340 页)仅此一例,亦可见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密分析和谨慎态度。

对于古典小说本身,鲁迅特别重视那些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摆脱了儒家观念的束缚。如唐代传奇,《史略》先引用了胡应麟《笔丛》中的一段话:“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然后作了引申和发挥,指出:“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1](第 70 页)并说,《太平广记》收集的,“实唐代特绝之作也”^[1](第 70 页)。对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评述说:“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1](第 93 页)对于宋代文人之志怪,鲁迅评价甚低:“宋一代文人之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1](第 110 页)实因宋文人志怪缺乏独创。关于《红楼梦》,鲁迅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1](第 233 页)“《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1](第 338 页)

鲁迅评价最高的是《红楼梦》,看重此书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应该说,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该肯定的基本都肯定了;该继承的也一一指出了。他特别重视的是创新的精神和业绩,如《红楼梦》能勇敢地成功地突破传统,超越传统并开创新的传统,尤其难能可贵。就小说领域而言,《史略》等是继承中有反传统的精神和线索。

《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研究著作,读者主要是学者和大学生。这些论著,重在学理分析。《坟》《热风》和上述学术研究论著不同,大都是对社会、文明的批评,面对的大多是普通的读者,矛头直指当时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其锋芒所向披靡,冲击力特大,请看下列精到见解:

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在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屏淡。^[2](第 313 页)

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2](第 328 页)

所谓中国老,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子,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

的诅咒！……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2](第216,217页)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2](第122页)

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2](第350页)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2](第124页)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2](第213页)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已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2](第195页)

……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2](第200页)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2](第241页)

鲁迅“五四”时期发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批评,和对外国文化新潮的吸纳表示最热烈欢迎的言辞,几乎都已收录在这里。我们如果将它们置于文化急剧转型的“五四”时期,置于大多数知识精英致力于创建与世界现代文化接轨的新文化(有别于带有浓厚封建烙印的传统文化)的初始阶段,置于封建制度刚刚被推翻的时刻(1912年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才建立,不久封建王朝复辟连续发生两次),当钦佩作者视野的广阔,论断的深刻和睿智,批评的锐利与切中要害。归纳起来,主要是:(一)认为中国的历史、儒家的经典,是封建统治者“治人”的典籍。也许有人认为这判断失之笼统。其实,就这些意识形态的主流和实质而言,应该说是准确的。十三经二十四史,无不是企图总结封建统治者统治国家的经验教训,藉以进谏统治者,警示后人。鲁迅认为中国的百姓在封建社会的地位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种时代,他希望青年们“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种时代”。这概括我觉得是无可怀疑的,这“希望”是美好的合理的,如果没有这“希望”,中国的命运也就很可悲了。(二)认为封建的“朽腐的名教”,“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形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许多人就死在这里。在鲁迅看来,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人肉筵宴的厨房。这揭露实不为过,在此前一百多年,戴震针对宋、明理学家的“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就说过:“后儒以理杀人”。鲁迅不过说得更形象更深刻更尖锐罢了。他号召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这并非情绪化的呼喊,是时代的理性声音,也是可以实现的期待。(三)鲁迅的确主张反传统。这主要是由于传统有二重性,它既可成为新传统的营养,也是创造新传统的阻力,中国之所以难以改革,原因之一也在这里。鲁迅的确主张破传统,但他反对奴才式的破坏和盗寇式的破坏,力主要有“理想的光”,要做“革新的破坏者”。这就与历史上许多反传统者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划清了界线。由于文学贵在突破和超越传统,贵在创造,学术事业贵在创新,所以鲁迅反复强调:“容纳新潮,脱离旧套”,做“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这道理不言自明。人们会产生疑问的是:鲁迅为什么说,即使崇拜的是外国的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这,鲁迅也早已作了解答:主要理论根据是,当时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互存的气息”^[2](第356页)。达尔文的进化论,易卜生的民主主义,较之孔子、关羽的思想,显然要进步的多;阿波罗(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这虽然是神话,但比中国的

迷信说法有什么传播疾病的瘟将军(瘟神)和所谓掌管灾难的五道神,要接近事理些。总之,鲁迅是为了我们这个衰弱的落后的古老国家能免于灭亡,独立于世界,为了我们这个衰弱的落后的古老民族能觉醒、自强、自立,他的出发点是为国家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那些非议鲁迅的人既不针对鲁迅的具体言论,也不全面概括其要点,信口雌黄,令人啼笑皆非。

对传统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留恋过去那贫乏粗陋的状态;制度文化方面,除了别有用心的(如西藏的达赖和西方某些想在西藏恢复奴隶制的人),恐怕找不到多少希望封建皇帝复辟的奴才;但在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如道德、文艺、美学、哲学等,既有社会意识形态性;同时又具有抽象性,即超越时空的一面。从后一方面说,具有可继承性。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古典小说和古代文学给予了应有肯定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应考虑到:《坟》中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是论文,方方面面一一论及。《坟》中其他文字及《热风》系杂文,有的还是篇幅极短小的“随感录”,不同于论文,它论述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力量剖析、攻击对象的要害。鲁迅说:“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3](第 40 页)鲁迅的杂文,往往是“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4](第 452 页)可以说,是攻其要害,不及其余。这样,就不能不针对带有封建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毛病,予以痛击。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对传统文化与在杂文中表露的观点无异。正如《狂人日记》中狂人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人与人的关系、传统的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吃人”。《药》《孔乙己》《阿 Q 正传》《白光》《祝福》《长明灯》《示众》《孤独者》《伤逝》,无不是写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礼教“吃人”。这些作品中的许多人都充当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一分子。这些作品“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5](第 239 页)。至于《野草》中的观念和情绪,不能说没有魏晋文人及其后继者的精髓,但更多的是异域声音的回响。

鲁迅最忧虑的是: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是吃人文化,不是“真的人”的文化,并“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他当时认为,只有破除旧的文化,创建现代的“人”的文化,才能培养出创造第三样时代的人才。鲁迅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观点,与“五四”时代文化先驱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等是一致的,差别只是大同小异。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他文化派别(如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己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鲁迅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的政教层面上展开,这样最便于深刻地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制度的紧密联系,最易触及传统文化的实质和要害,也最能暴露传统文化的虚伪性。儒家经典的思想基石是封建等级制度,鼓吹的实质上是奴化思想。鲁迅对“孝”、“节烈”、“仁义道德”以及他论著中所指认的社会现象,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社会制度上寻找根源,因而特具深刻性和尖锐性。还应看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带有普泛性,无论他的小说,还是杂文,都往往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某一类型的人,乃至是大多数人,即所谓“国民劣根性”。有时甚至将自己也包括进去。如《狂人日记》中的“我”承认:“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在《我之节烈观》里所指斥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也难免不卷入。鲁迅这时不是像法官,只审判别人,而是以负罪的沉重心情来控诉。说鲁迅“五四”时期反传统,道出了他的主导精神,但并不全面。他的反传统,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主要是“破除”;而在文艺等方面,则主要是冲破、超越、创新,也就是占有、掌握、分析、批评、消化、吸取有益的成分,进行创造,并非完全断绝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鲁迅“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思想逻辑起点是人的自由、人性的正常发展,和将来必胜于过去;使用的思想武器是进化论、人性论,是“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主张“爱”,第一是“爱己”,即“保存生命”,第二是“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对下一代,长者应该“理解”、“指导”、“解放”,应该: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第 130 页)

鲁迅的伟大,其一也在这里。

鲁迅“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已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对鲁迅说三道四甚至是全盘否定的人有他们的自由,但如果要是认真的学理论辩,我以为至少应做以下工作,第一,对鲁迅的言行做全面考察,第二针对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言行、理论方式进行历史分析。

从中外古今各国的文化史考察,可以发现: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有别,因而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主导倾向。一般说,在社会急剧变革和文化急剧转型期,进步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往往都倾向于“反传统”;而在社会较稳定的文化建设期,“继承传统”的呼声往往居于上风。我们不能用今天看来似乎合理的观念,来要求乃至否定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思想文化先驱鲁迅。何况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儒家文化是否应该破除?两千年前诞生的儒家文化,能否使我国繁荣富强,实现现代化?更应该是我们不能不思考和回答的有关国家民族的大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鲁 迅. 鲁迅全集:第 9 卷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鲁 迅. 鲁迅全集:第 1 卷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 鲁 迅. 鲁迅全集:第 11 卷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 鲁 迅. 鲁迅全集:第 4 卷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5] 鲁 迅. 鲁迅全集:第 6 卷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何良昊)

LU Xun in May 4th Movement & Traditional Culture

LU Yao-d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U Yao-dong(1930-), male,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bstract LU Xun during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the eldest son and brother in a very typical Chinese family and a state official in charge of the cultural affairs. His words and deeds were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lecturer in Peking University, he showed his disagreement with the norms, which can be found in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He dared to appreciate the new thing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and express his own understanding. As a writer and thinker, Luxun opposed to those norms radically. He did so mainly owing to the demands of the age when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were in radical transformation. He broke down the norms of the social institution, caste, politics and religions, and transcended the norms of the classic literature. Anyway, Luxun's opposition to the norms does not mean a completely break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May 4th; LU Xu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